总　　序

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代。清词接武两宋，踵事增华，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成为词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认为，“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由此，不少学者遂持“宋后无词”的片面看法，对金元明清词非贬抑则忽略，以致造成了词史研究的许多断层。但是，清词确实上继两宋之盛，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

首先，较之宋词，清词的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才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几乎无事不可以入词，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义上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等，多为学人，其以治经之法治词，不仅对词集的流播校辑贡献甚大，而且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更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之疆域。第三，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间,阳羡、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谭献《箧中词》二),而浙派影响尤大。沿及嘉道间,张惠言兄弟《词选》出,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揄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降及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而属于上述流派又加以变异者,或不属特定流派而自出机杼者,亦复不少。第四,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代的词论发展达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从一个方面开拓了抒情诗的理论,同时也就提高和发展了其创作,比起前代词论实不可同日而语。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清词才高潮迭起。第五,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亦达到空前的程度。据已出诸总集统计,唐代计有词人 170 余人,词作 2500 余首(据张璋等《全唐五代词》统计。按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收录较此为多,但诸家标准不一,也无法统一);宋代计有词人 1430 余人,词作 20860 余首(据唐圭璋《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统计);金代计有词人 70 余人,词作 3570 余首;元代计有词人 210 人,词作 3720 余首(金元二代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统计);明代计有词人 1860 余人,词作 25000 余首(据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以及周明初等《全明词补编》统计)。而清代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 2500 余家,词作 60000 余首(据《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统计)。准此而论,清代词人当在 1 万以上,词作当在 25 万首以上。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多并不等于好,但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也是事实。第六,清词往往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加以深化,即在摹拟中求发展,不仅追求风格的多样化,更进一步追求多种风格的熔铸,从而创造了更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

以上所举,或有不够全面之处,但清词的价值已大略可见。前辈学人多有倡言清词中兴论者,如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云:“词

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云：“词之学剥于明，至清而复之，直接南北两宋，可谓盛矣。”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更具体分析了清词能上接两宋的原因，一在托体尊，二在审律严，并宣称：“我看清代文学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诗也不及明朝，独词较好。可知清人对于词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来，清词立在重要的地位，定无可疑的。”这些都并非无的放矢之言。

学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观念的更新和资料的发现。从观念来看，有必要特别提出经典化的问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即唐宋词在词学大盛的清代，已经经过了非常充分的经典化，取向或许有不同，但流别却非常清楚，清人所建构的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现在读者接受唐宋词的一座重要桥梁，王国维诸人所提出的观念，也正是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展现出来的。然而，这一经典化过程，“五四”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却处于中断的状态。尽管比较传统的词学研究者如上述沈曾植等人已经对清词的价值有过论定，可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下，真正进入接受领域中的清词，与其庞大的创作队伍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这就导致人们对清词的整体风貌认识不清，新的经典也因而无法产生。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资料的问题。清词在词的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处于“缺席”，这种情况的造成，也和清词资料的零散、缺乏整理有关。二者事实上互为因果：对资料的掌握不足使得观念的更新缺少动力，而观念上的一成不变，也忽略了对资料的全面搜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学术的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导下确定的研究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于文学经典的体认，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成说上面。在这种背景中，清词的研究也呈现出全新的气

象,而《全清词》的陆续编纂出版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清词》的任务下达给南京大学中文系,从而开始了这一划时代的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在此之前,清词的汇辑,自清朝初年起,直至清末民初,都有人做过。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蒋重光的《昭代词选》,王昶的《琴画楼词钞》,以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或卷帙繁富,或编录精审,都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但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近人陈乃乾辑录《清名家词》,计收有清一代著名词人百余家,人各成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汇辑,但他所辑也只是初步工作,所用底本有时并非足本,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编纂《全清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1. 展示清词的整体风貌;2. 丰富词史的研究思路;3. 为作家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4. 传记资料可补史传之阙;5. 校勘工作可提供多方面参考。2002 年,《全清词》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顺康卷》,凡 20 册,810 万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清词研究的走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2 年至今,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出版了 13 种,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更达 24 种以上。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以及远大的发展前景。《全清词》的其他各卷还在积极的编纂中,一旦出版,对清词乃至整个词学的研究所产生的进一步推动,乃是可以预期的。

二十五年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从事《全清词》编纂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清词研究的深入展开。通过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我们深切地感到,研究清词,不仅是对一个陌生领域的开拓,而且是对一种传统观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点有着更为深刻的

意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编纂了这套《清词研究丛书》,以展现词学研究的新进展。清词研究现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渐成这一领域的生力军。我相信,随着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不久就会到来,词这一经过漫长发展的文体在清代开出的“老树新花”,必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是为序。

张宏生

2007 年 9 月 6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目　录

总　序…… 张宏生　1

第一章　广东近世词坛研究序说…… 1
第一节　研究范围的界定…… 5
一、近代与近世 …… 5
二、岭南与广东 …… 10
第二节　关于近世区域词学研究 …… 15

第二章　近世广东词坛概述 …… 20
第一节　发展演进 …… 22
第二节　地域分布 …… 42
第三节　师法取向 …… 55
第四节　词学活动 …… 75
一、内部交游 …… 76
二、外部交游 …… 81
第五节　词体创作 …… 90
一、内容题材 …… 90
二、艺术风格 …… 100

第三章　近世广东词学的构建…… 106

第一节 音韵谱律…… 107
第二节 词籍编刊…… 114
一、基本情况 …… 115
二、词籍笺释 …… 116
三、词选 …… 123
第三节 词学批评…… 141

第四章 近世广东词坛的学人之词群体
——以陈澧为中心…… 187
第一节 交游与学术…… 190
第二节 《忆江南馆词》:“绰有雅音涵” …… 194
第三节 词学研究…… 203
一、词体研究 …… 203
二、词学批评 …… 215
第四节 附论…… 220
一、谭莹:“熙朝未必生材少,积习相沿爱铲除” …… 220
二、徐灏:“儒林文苑各分一席” …… 227

第五章 近世广东词坛的词人之词群体
——以叶衍兰为中心…… 236
第一节 诗与画…… 239
第二节 《秋梦庵词钞》:独秀一时的词坛“春兰” …… 247
第三节 词学贡献…… 252
第四节 附论…… 259
一、沈世良:“抱才不偶”、“多病逃禅” …… 259
二、汪瑔:“岭南风雅衰颓日,拔戟词坛大有人” …… 266

第六章　近世广东词坛的诗人之词群体
——以梁启超为中心…… 273
第一节　词体创作:“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 275
第二节　词学研究: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新变 …… 283
第三节　附论…… 288
一、黄遵宪:“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 288
二、梁启勋:现代“词学”初具规模的建构者 …… 295

第七章　结语
——广东近世词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307
一、粤东词(学)史中的广东近世词学…… 307
二、近世中国词(学)史中的广东词学…… 311
三、近世广东文学中的广东词学 …… 314
四、广东近世词学的历史影响 …… 316

附录一　近世广东词学系年初编…… 319
附录二　近世广东词籍简目初编…… 387
附录三　近世广东词人的词学交游…… 430
一、近世广东词人的内部交游 …… 430
二、近世广东词人的外部交游 …… 443
三、待考对象 …… 476
(一)外籍游宦者 …… 476
(二)年里及词作存佚情形不详者 …… 480

主要参考文献…… 486
后记…… 502

第一章　广东近世词坛研究序说

词史发展到近世，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条件都发生了不同于已往的变化，这势必对词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因此，研讨环绕近世广东词坛的诸多问题，对于揭示千年词史的终极走向及其内在的若干嬗递规律，具有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目前，尚未见到系统研究近世广东词学的专著，但已有高质量的单篇论文出现，如刘石的《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并且，近些年来，除广东省组织编纂的《岭南丛书》、《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文库》等之外，以岭南为题的学术专著有不断涌现的趋势，如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刘圣宜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本选题的展开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为最大限度地达成选题初衷，本文首先从时、空两方面划定具体的研讨范围。

第一，从广东词史自身的发展历程着眼，不囿于传统的古、近、现代文学三大板块区分法，将研讨的时间范围定为嘉庆二年（1797）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名曰“近世”。

第二，探究“岭南”这一历史地理名词所辖范围在历代的变迁，区别岭南与广东这两个有所不同的地域名词，确定研讨的空间

范围为今广东省全境。

同时,对近世区域词学研究作一粗略述评,并尝试借鉴迄今为止区域文学研究的成果,对区域词学研究尤其是近世区域词学研究在理论和操作层面上进行初步探索。以此作为全文的第一章“广东近世词学研究序说”,以导入正文。是为绪论部分。

其次,从词体创作和词学研究两个层面对近世广东词坛作出综合性的、宏观性的描述,以此作为全书的总论部分。

(一)分演进历程、师法取向、地域分布、词学活动、词体创作等五个方面对关涉广东词坛的若干纲要性问题进行总体论述,力求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世广东词坛的概貌及岭南词风的特点。是为全书的第二章“近世广东词坛概述”。

第一,通过细致考察近世广东词坛的宗风授受轨迹,可以据此将 150 余年的近世广东词史大致上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处于浙西词派的笼罩之下,是指嘉庆二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40 余年的时间;中期经历了由浙转常、接受并消化常州派新词学理论的全过程,是指道光二十年至民国八年(1919)80 年左右的时间;后期在完成对常州词派的接受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新的创造,是指民国八年至民国三十七年约 30 年的时间。

第二,通过对粤东词人效体用韵情形进行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粤东词人的师法取向直指唐宋;在不同的时期,粤东词人的取法重点存在游移的现象,并且不曾与主流词派的取向保持完全一致。

第三,通过表格的形式直观呈现 342 位粤东词家在各府县区域的具体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历代粤东词人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广州府一直是粤东词坛的创作和研究中心,而其中清代特别是近世时段,则是粤东词坛创作和研究的双重重心所在。在清代特别是近世,广州府在粤东一地词学最为兴盛是多种合力共同推

动的必然结果。

第四，通过详细考察并分析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广东词人在内部频繁交流、切磋词艺、苦练内功的同时，以个体或小群体分别交游的方式保持着与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当时京、沪两个词学中心的全方位联系。频密的词学活动，对于扩大粤东词坛的影响，改变其长期以来僻居词界边缘的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五，通过词体文本细读、分类，可以发现：近世广东词中出现了较多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新内容。单纯地从开拓词的题材和扩大词的表现能力的角度讲，它们甚至比粤东词坛的正声——反映社会现实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更为有功于词史。近世广东词的主导风格仍然是传统的雄直雅健之风。近世广东词风又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悱恻清幽也是近世广东词的风格之一。

（二）从音韵谱律、词籍编刊、词学批评等三个方面对广东词学作理论层面的专题论述，藉以对近世广东词学自身的构建进行系统勾画，并对近世广东词学在近世中国词学建构中的贡献和应该占有的地位作出适当的估价。是为全书的第三章“近世广东词学的构建”。

第一，广东学者词人的《声律通考》和《乐律考》是整个清代九种代表性词乐研究著作中的两种。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相关领域或多或少地取得一些进展，是因为他们有幸站到了包括陈澧、徐灏在内的这些巨人们的肩膀上。

第二，通过列表统计近世广东词籍刊刻情况，可以发现：与此前相比，无论是从词籍刊刻的绝对数量来看，还是从同一时段范围内该数量在广东乃至全国词籍刊刻总量中所占比例而言，都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其中，《白香词谱笺》、《稼轩词疏证》、《吴梦窗词笺释》是近世广东词坛上出现的词籍笺释类代表性著作。由近世本地词人编纂的词选如《粤东词钞》、《全清词钞》、《广箧中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艺蘅馆词选》等，不仅对研究广东本土词学具有重要的直接价值，而且对研究整个中国清代、近世词学也具有多种不同的价值。词籍的大量搜集、整理、结集出版是促进词学发展的重要环节，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施，表明广东词学已经进入总结、提高的重要阶段。

第三，就词学思想的表现形式而言，近世广东的词学理论资料涉及到了词选、词话、词集、序跋批注、有关词学的书札与论文、论词诗词、诗话与曲话等七类形式。综观这些词学批评资料，它们表现出了广东近世词学批评的如下几个主要特点：其一、推尊常州派词学，同时在观念形态上表现出混杂与交融的双重特点；其二、关注为人品节；其三、凸显历史意识；其四、自觉追求论述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地域词学观念逐步强化；其六、注重词学研究所使用方法的科学性；其七、在重视词学研究的同时，强调词体创作的重要性，即要求既要知又要能。

复次，对近世广东词坛上的若干关键人物所代表的词人群体进行详细研讨，以求在共性之外见出广东词人的丰富个性，同时探究他们之所以能够支撑起广东词坛这一片天空的缘由，以此作为全文的分论部分。本文选定陈澧、叶衍兰、梁启超等三位近世广东词坛上的风云人物，并以他们为中心进行全面研讨，以期带动对于广东词坛上相关词人或词人群落的论述，收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功效，作为全书的第四、五、六章。笔者认为，这三人分别代表了近世广东词坛学人之词、词人之词和诗人之词的顶尖水平，以陈澧为中心的学海堂词人群、以“粤东三家”之首叶衍兰为中心的外省占籍词人群、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人志士词人群，将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审美观与岭南雄直的诗风有机地融为一体，自成此期国内词坛一格，共同开创出了近世广东词坛的新局面。

最后，通过与其他时段进行纵向比较，历时性地考察粤东词学

史中的广东近世词学;与其他区域进行横向比较,观照中国近世词学史中的广东词学;与其他文学样式进行横向比较,共时性地考察近世广东文学中的广东近世词学,力求给予近世广东词和近世广东词学一个较为准确的历史定位,以此作为全书的第七章“结语——广东近世词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笔者认为,近世广东词学是迄今为止粤东词学所达到的最高峰,它在广东近世文学中的地位较之前代粤东词学在同期文学中的地位是无法比拟的,它是整个近世中国词学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对整个近世中国词学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广东当代词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

为使全书立论与阐发建立在确凿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笔者同时进行了文本调查与校正工作,即初编广东近世词籍目录,点校《粤东词钞》。又对广东近世词坛词事予以细致编年,集中展现广东词坛词人生平、创作及重要词学活动,以理清脉络、还原历史。贯穿其中的便是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文献与理论并重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研究范围的界定

一、近代与近世

近代与近世是两个不同的时段概念,需要首先予以厘清。

关于近代的断限与分期,史学界、文学界以及词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在史学界,戴逸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用“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论点,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以下三个时期:1840—1873 年,

1873—1901 年,1901—1919 年。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使用“近代中国”一词,按照冯契在序中所言,则“是指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

在文学界,建国以前,自 1923 年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后,近代文学的起迄年代问题自然也就被提出来了。对于它的上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主张近代文学起始于晚清。其中又有起始于戊戌变法与鸦片战争的区别。最早把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并主张以戊戌维新运动为其起点的是写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的陈子展。朱自清、钱基博、吴文祺、余慕陶等人也都持戊戌发端说。把近代文学上限确定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是卢前、贺凯、伍启元等。第二种,主张近代文学始于晚明。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鸟瞰”一章的开头即提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的主张。但到 1958 年郑振铎放弃了这种说法。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下限即终止年代,当时的文学史家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着眼点,即大都是追溯“五四”文学革命的源头。因此,他们更为重视的是二者相互联系衔接的一面,把晚清文学改革与“五四”文学革命视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只有郑振铎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明确提出近代文学“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建国以后三十年之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成为近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分期的指导理论。由此,近百年的中国文学被划分为两个时期,近、现代文学的概念正式分离,“近代文学”专指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旧民主主义文学,“现代文学”或“新文学”专指“五四”时期至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起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便成了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近代文

学的断限。不过，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1958 年郑振铎提出 1840—1949 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文学应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称“近代期”。林庚对这一主张表示赞同。但不久郑振铎遇难，这一主张没有得到进一步申说，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此期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近代部分的内部分期，大体有两分、三分和四分等三种分法。两段分法以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为代表，把近代文学史分成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前后的文学和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两个时期。三段分法以北大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它把近代文学史具体划分为三段：1840—1894 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启蒙时期，1894—1905 年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1905—1919 年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时期。这其中，郭延礼的三段分法是，第一期 1840—1873 年称为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学（郭氏后来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下同），第二期 1873—1905 年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第三期 1905—1919 年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四段分法以复旦大学本《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为代表。它的分期法与北大本文学史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将第三期又以辛亥革命为界再分成两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近百年文学史的分期，出现了以下几种意见：其一、主张维持目前通行的近、现、当代的格局，以王瑶为代表。其二、主张近、现代合为一代，以任访秋、陈学超、马良春、钟贤培、梁淑安、牛仰山、蔡景康等为代表。其三、主张近、现、当代合一，将近百年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以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为代表。徐鹏绪、张俊才所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认为：本时期有关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和研究比以往更为广泛和深入，但还没有

出现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断代分期方法能够替代过去通行的那种断代格局。这种情况短期内恐怕也不会出现。

在词学界,较早对近代词史的断限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是施蛰存。他在《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一文中指出:

> "近代文学"是文学上的近代,"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
>
> 如果从文学发展的情况看,……近代文学的下限应该是1917年……而不是1919年。……至于上限的情况,恐怕《大系》的各集都不能一致。……从旧诗词的近代精神来定选录标准,则诗应当从"同光体"开始,词应当从文廷式开始。①

此外,严迪昌也指出:

> 本编冠名"近代",断限既以时世人心趋变为准,兼依词史衍变走向为参照,故不尽据社会政治事件之猝发,而兼及上述两方面之先兆演变期。
>
> 入编词人行年上限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之后,下限取生于光绪十年(1884)。除个别有关词林风气或著作甚早者外,一般卒于一九三五年后或更晚者不录,以俟《民国词钞》之续。②

又,谢桃坊从词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近代词学"的上下限是1797年和1919年③。

---

① 施蛰存《北山四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
② 严迪昌《近代词钞·例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03页。

施、严、谢三家所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般认为的八十年近代文学区间。本文认可严先生上述论断中提出的文学史断限标准：一方面，将时世人心的趋向和变化与文学史自身的衍变和走向均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将社会、政治形势与文学史进程发生骤变之前的先期征兆和逐渐演变期也考虑在内。由此衡量，就整个的中国词史而言，嘉道之际的确应该被确定为近世词史的起点。因为通常被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常州词派无论在词学理论上，还是在词学实践方面，都已在此间渐趋成熟。同时，学界公认的近代文学开山之祖龚自珍、林则徐等等也都已在此间登上词坛，并取得了可观的创作实绩。尽管说，粤东由于僻处南疆，直到晚清后期才最终完成对常州派的吸纳与消化，但事实上，粤东词坛完成由浙转常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起点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嘉、道之际，即嘉庆二年张惠言《词选》问世之后至道光十二年（1832）前后周济《词辨》、《宋四家词选》刊行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因此，本书为免却不必要的争论，摒弃“近代”这一常用的文学史分期概念，而代之以“近世”这一特定的时段范畴①，并将所要讨论的广东近世词学的“近世”时段范围的上限定

① 曾毅《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文学史分期中使用了“近世”字眼，这种分期法是借鉴了日本学者有关的研究。内藤湖南（1866—1934）曾经首先提出，可以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到西汉为止）、“中世”（东汉到唐）、“近世”（宋以后）三期。此种分期法，参考的是欧洲历史的分期标准。根据在日本较为流行的辞书《广辞苑》中有关“近世”和“近代”的解释，日本中国学家所说的“近世”主要是指中国相当于封建制后期而类似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时期。至于中国近世以后的时期，日本的中国学家一般以日本汉字“近代”相指称；中国学者称之为现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则都称之为“近代文学”。理解了这种区别，我们就可以知道，曾毅《中国文学史》中所谓“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其实相当于日本中国学家所说的“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详参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简略交待这一学术背景，是希望能够说明，本文中所谓“近世”，实际上只是借用了“近世”这一既成用语，同时又赋予了它独特的时段内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